



国力论



王 琢 著
黄 菊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 力 论

王 琢 著
黄 菊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 力 论

王 琢 著
黄菊波

*

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80×1106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78,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4166·280 定价：0.4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形成	(9)
一、从历史经验的误解谈起	(9)
二、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面成功	(14)
三、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	(17)
四、五十年代的新课题	(26)
五、马克思主义的新答案	(30)
第二章 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运用	(37)
一、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小调整	(38)
二、“左”的错误的干扰	(40)
三、第一次经济调整的全面胜利	(45)
四、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49)
五、二十年的历史检验	(53)
第三章 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新发展	(58)
一、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新发展的主要标志	(59)
二、分配结构具有制约和调节生产结构的作用	(63)
三、合理的积累率是一个基本国策问题	(66)
第四章 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研究	(73)
一、合比例的生产结构是组织财政、信贷、物	

资平衡的基本前提.....	(73)
二、物资供需平衡是组织财政、信贷平衡的基 础.....	(76)
三、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的统一平衡.....	(78)
四、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85)
五、财政收支平衡起着总的制约作用.....	(92)

前 言

本书取名国力论，是取陈云同志概括的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简称。本书研究的主题，是以国力为中心，运用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以控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的过程，就是增强国力的过程；但是，现存的国力，又是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的起点。我们绝不可以超越这个起点前进。如果我们的经济建设超过了国力——财力、物力所能负担的界限，不仅不能增强国力，而且一定会破坏国力；不仅破坏国力，而且会搅乱经济建设本身，破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造成国民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陈云同志总结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经验，也研究了国外的经济建设经验，从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中，概括出国力制约经济建设的理论方法。这个理论方法，十分强调国力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本书取名国力论这个简称的一个原因。

陈云同志提出的国力论，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简便易行的，以国力为中心的，运用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以控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所以国力论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怎样制约国力与建设的平衡。我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计划经济的灵魂；没有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也就没有计划经济。只有组织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我们的经济才是计划经济，才能保持比例协调，才能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摆脱反复折腾，才能推动生产力较快发展，才能为改

善人民生活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大好局面。

实践证明，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受国力的制约，而国防建设支出和援外支出，以及其他方面支出，也要受国力的制约。如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界限，勉力为之，难以为继；而且时间长了，也会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类问题也属于国力论的研究课题。我们为了突出主题，暂且置而不论。

国力论作为制约国力同建设平衡的理论方法，它的基本点简单说来，就是突出强调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统帅，以社会再生产规律为依据，以两大部类结构基本合理为条件，利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组织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内部平衡，制约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平衡，控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比例协调。

从五十年代中期，陈云同志提出国力论到今天，已经有二十五个年头了。这二十五年的经济建设历史，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按照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来控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我们的经济建设就能取得稳定发展；反之，不按照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来控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致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界限，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受到挫折。这就是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国力论，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它是真理，是科学，是客观规律的概括。

国力论属于计划经济理论，又是计划经济理论的发展。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工作，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运用计划调节，又要运用市场调节，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后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命运

如何？还要不要组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四大平衡？研究国力论有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问题，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问题，以及我国经济改革走什么路子的问题。

我国经济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前主要是冲破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问题；当然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右倾思想的干扰。我国经济改革不会，也不可能照套国外的模式，一定会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走出自己经济改革的路子，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

什么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只有正确总结我们自己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才能准确地捉住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我国现行的经济形式还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的产品经济，即以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这种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有四大特征：（1）产品经济要求“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①，要求整个社会办成一个“大企业”，国营企业成了“生产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计划安排，生产出的产品实行计划调拨和统购包销，由此产生了“计划一统到底”的计划体制。（2）要保证计划一统到底的计划体制得以通行无阻，由此产生了集权制的经济体制，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国家行政机关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方面，要求实行国家行政集权制，企业和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成了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物。（3）实行集权制的经济体制，包括中央、地方和各级行政机构的集权制，由此产生了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要求，而不是主要用经济办法调节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7—348页。

济活动。所谓行政办法，包括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活动，用行政系统、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行政权力来组织经济活动。

（4）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为了保证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通行无阻，就要排斥所属企业及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由此产生了“企业核算，国负盈亏”的企业体制，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以及存、贷两条线的银行体制，把绝妙的金融机构变成了“大出纳”。这就导致从职工到企业、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地方各级经济管理机构，共捧“铁饭碗”，同吃“大锅饭”。

从计划经济来说，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思想路线又端正，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排除了盲目蛮干、瞎指挥、高指标和保守倾向的干扰，也能取得全面成功和巨大胜利。我国“一五”

（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计划的全面成功，第一次经济调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五年）的巨大胜利，这十年的历史就是证明。但是，产品经济形式在现阶段确有严重缺陷，不利于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它的本质的缺陷主要是三条：（1）产品经济形式使得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抑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计划经济缺乏内在的动力；（2）产品经济形式为领导和组织经济的瞎指挥提供了两个方便条件：一个是，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要求实行集中制的体制，而集中制的体制使瞎指挥得以通行无阻；另一个是，产品经济形式带来的“铁饭碗”和“大锅饭”，使得经济活动失去了物质利益的制约，也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一旦干错了，干坏了，造成损失，没法追究经济责任。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归人民负担。前一条，使得一些人能够瞎指挥，因为瞎指挥可以指挥得动，从上到下都得听，都得执行。后一条，使得

一些人敢于瞎指挥，因为指挥错了，造成重大损失，可以不负经济责任，也无法追究经济责任。为什么瞎指挥可以连续数年之久，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3）产品经济要求用集中制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使企业和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成为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使经济活动受政治思想运动的左右摆布，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持续的稳定发展。

我国三十年来的多次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抓到产品经济这个主题，即没有抓到把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改革为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这个主题。经济改革不接触经济形式，一提经济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集权和分权上兜圈子，时而歌颂中央集权制，强调集中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好得不得了！人们为什么这样歌颂中央集权制呢？因为国家权力集中，这样的上层建筑，正好适应产品经济的需要。产品经济要求集权制。有了集权制，就能在全国范围统一指挥生产，统一调度产品，人们以为这是保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和综合平衡的唯一法宝。时而又发现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端：（1）权力过于集中，束缚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权力过于集中，为瞎指挥提供了条件，冲击全局，带来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人们看到了中央集权制有弊端，再回过头来使劲赞美地方分权制。一九五六年大造了舆论，一九五八年实行权力下放，采取抑制中央集权、扩大地方分权的方针。这个方针执行的结果怎样呢？也有两个弊端：（1）地方权力大了，冲击了全国统一的产品经济，引起了混乱，导致了盲目性。特别是地方权力大了，而地方又把权力层层下放，以致层层行政长官都有权发号施令，层层行政长官都有权下达计划指标，而且指标又是层层加码，最后汇总起来，指标无边，计划无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和综合平衡。“大跃进”的三年是大放权

的三年，也是大混乱的三年。（2）中央放权给地方，地方不放权给企业和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从企业来说，仍然是统得过多过死，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计划经济仍然缺乏旺盛的活力，也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于是，人们又发现地方权力大了也不好，只好走回头路，重新收回一部分地方权力，使中央集权更加膨胀。对于这种行政权力放了又收，收了又放的做法，应当怎样评价呢？从调整上层建筑内部结构来说，这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央权力大了就下放一些给地方，地方权力太大了，中央就回收一些。这个评价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从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结构来说，这种做法是行政体制改革，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它没有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企业及企业性质的公司的体制改革问题。所以这种做法不可能抓住经济改革的主题，不可能解决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主要教训。

总结经济改革的历史教训，明确经济改革的主题，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改革的主题，不是在产品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圈圈里搞小改小革，也不是以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取代产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是全民所有制问题。我国全民所有制形式同我国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是适应的，是能够继续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调整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生产关系结构。国营企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生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具有两重性：（1）从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企业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2）从国营企业同代表国家的经济管理机构的关系来说，企业隶属于国家，又不完

全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两者的统一，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结构，要求实行“企业经营，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企业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内部的这种生产关系结构和相应的企业经济体制，决定了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不是产品经济的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的主题是：以商品经济取代产品经济，以商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取代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

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从产品经济改革为商品经济，我们仍然坚持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觉调节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自觉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又要使计划经济充满旺盛的活力，将在计划指导下充分运用市场调节，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么，我们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经济，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的命运如何呢？我们认为，作为计划经济理论方法的一个发展的国力论，必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运用市场调节的基本条件，而市场调节又会补充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不足。我们的经验是，高指标，留“缺口”，把商品供需关系绷得紧紧的，就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陈云同志概括的国力论，有两点要引起我们的重视：（1）国力论是以价值量的平衡制约使用价值的平衡，因此，它属于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不属于产品经济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2）国力论是以五十年代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为历史背景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反映一些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具体特征。因此，我们在肯定国力论的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指出它的某些具体形式和方法，将会随着经济改

革的深入发展而有所变化。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力论的研究工作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陈云同志的国力论，继续研究陈云同志的国力论。我国经济改革正在进行，正在深入。我们为了讨论国力论的命运问题，在这方面也讲了一些看法。当然，我们的看法也将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这个书稿是我们挤了点时间匆促写成，不妥之处，请读者教正。

第一章 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形成

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正是这个矛盾推动了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调节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组织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出现消费品供应不足的现象呢？有时为什么还会同时出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应不足的现象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反复出现这种商品供应同有支付能力需求相脱节的现象，究竟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呢？是计划工作失误引起的？是计划调节受到错误思想干扰造成的？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呢？产生这种商品供应同有支付能力需求相脱节的症结何在呢？怎样才能解决这样的矛盾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索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回答的一个实践问题。陈云同志的国力论，即国力制约建设理论方法的形成，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

一、从历史经验的误解谈起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疯狂破坏，被迫组

成了战时的经济结构，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原则。苏联当时把它叫作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紧密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克服了战争和饥荒带来的重重困难，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干涉，消灭了国内反革命势力，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迷梦彻底破灭了。

苏维埃政权终于赢得了胜利，站稳了脚跟。苏联迅速转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而后又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苏联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革命胜利；而胜利后的苏联，又遭到连年的战争破坏，国民经济被搞得支离破碎，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疯狂破坏，给年轻的苏联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就是苏联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国际国内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当时，苏联面临一个严重的战略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哪里开始？从重工业开始，还是从轻工业开始？苏联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断然选择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苏联选择了这条工业化道路，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是，我们今天来评价苏联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仍然应当肯定苏联工业化道路是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选择这样的工业化道路，因而是必要的；而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它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因为，处于帝国主义势力包围之中的苏联，不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搞重型的战备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摆脱被动挨打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显然，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重型的战备经济结构为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实行这条工业化道路，苏联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对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对此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们肯定一切，竟然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普遍规律，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应当指出，这种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观点，曾经使苏联深受其害，也使其他一些国家深受其害。

在苏联，由于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作为长期方针，结果违背了社会再生产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一三年比较，重工业增长四十五倍，轻工业增长七点八倍，农业只增长百分之四十六，而粮食产量还略低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重工业孤军深入，失去了依托。这种重型的战备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动员大量财力物力集中于发展重工业，这就必然导致国家经济建设同人民生活之间尖锐的矛盾：一方面，重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这是因为，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必然大量增加职工人数，工资总额不断增加，社会购买力不断增加，而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消费品生产不足，于是社会购买力同市场的消费品供应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消费者拿了货币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本来是甲、乙两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引起的经济现象。可是一些苏联经济学家，竟然从这种经济现象引出了社会购买力跑在生产发展的前面，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结论。这显然是一种奇怪

论。这种错误观点，在生产上掩盖了甲、乙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在分配上掩盖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使得生产结构益愈畸形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挤了消费资料的生产，重工业的发展挤掉了人民生活消费，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居民购买商品要凭票证，甚至出现商品脱销，乃至物价上涨的怪现象。

四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走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老路。从国内条件来说，这些国家一无发展重工业的资源，二无发展重工业的技术基础。从国际条件来说，这些国家同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没有必要再搞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重型经济结构。可是，这些国家没有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照搬国外的老经验，一味片面发展重工业，挤了消费品的生产，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经济上的深刻矛盾最终必然发展为政治上的深刻矛盾。东欧国家中，最先吃了这个苦头的就是匈牙利。匈牙利的反革命势力，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消费品供应不足的强烈不满，发动了反革命事件。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爆发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卡达尔依靠苏联军队，镇压了这次反革命暴乱。拉科西、格罗下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他们认为：“10月23日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过去的领导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强加给人民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阻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这个分析提到经济建设不从本国经济条

^①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163—164页。